

代有关敬重生命、爱护环境和珍视资源的文化思想与观念。夏咸淳《明代文人的生态关怀》(《鄱阳湖学刊》第2期)从草木植被、山川体貌、人居环境三个方面,阐述明代文人基于山水审美活动而引发的生态关怀;而审美与环境的联系正是当前环境美学特别关注之点。

## 五 结语

学科整体繁荣的背后,亦应看到部分旧问题在悬而未决的同时又涌出一些新问题。旧问题如学科理论框架体系尚未取得公认的清晰描述;提倡多年的近代城市环境史研究基本一直居于“冬眠”状态,仅有的一点成果基本都集中在城市公共卫生问题上;研究的时段分布仍以史前、先秦和明清以来为主,中古时期环境变迁研究成果相当薄弱;研究的地域分布仍然聚焦于传统的江河流域和平原地区等。新问题如在叙述中术语的界定和内容的控制;如何以公允的立场来评价古人对环境所实施的行为等。而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成为以后必须加强的方面。

总之,经诸多学界前辈多年筚路蓝缕开拓之后,环境史的前景至今基本可以勾勒如下:作为继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之后的环境史,基于其内在潜力与巨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必将推动二十一世纪中国史学的蓬勃发展。

# “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中国西南与欧亚古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7月28—29日,“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中国西南与欧亚古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隆重召开。本次学术研讨会由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等单位联合主办,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承办。来自国内外高等院校、研究院(所)、博物馆、文物考古研究院(所)等30余个单位的7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围绕古蜀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南方丝绸之路考古发现与文物研究、南方丝绸之路艺术与宗教研究等方面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的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古蜀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段渝做了大会主题发言,他在《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中指出:古希腊罗马文献中关于东方的“赛里斯”、“长寿者”等貌似怪诞现象的记述,在上古时代的中国西南有迹可寻,是古希腊罗马作家根据他们在中亚和印度时的耳闻所进行的实录性记述,表明当时已有从中国西南至印度和中亚的交通线。先秦两汉中国古文献的有关记载,可以证实中国西南早期国际交通的实际情况。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和金沙遗址考古中不少印度和近东文化因素的发现与研究,从考古学上证明了商周时期中国西南对外交通的存在,而印度、中亚、希腊、罗马古文献关

于中国丝绸西传的记载,与中国古文献和考古资料相互印证,则证实了商代古蜀丝绸的西传和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及其年代。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显丹在《古代文化的交流与五尺道》中指出,从出土文物来看,蜀滇之间早在商代就有了文化交流,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通往南亚和西亚等地。五尺道的开通应该是在商代,它起着重要的商贸作用,而不是秦汉时期为了中央集权和边疆强化军事而修建的道路。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颜信在《南方丝绸之路与先秦古蜀文明》中认为,南方丝绸之路在早期西南地区的对外文化交流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各区域文化交流的纽带,它促成了古蜀文明的形成,并促进文明不断发展,甚至影响其他文明区域。

二、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讨论热点,学者们从经济贸易到民族民俗文化交流再到如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耿昇在《法国里昂商会中国考察团对四川养蚕业与丝绸业的考察》中指出,以四川为主体的中国大西南,历来都是丝绸之路,特别是西南丝绸之路的出入基地、商品供应地和集散地。西南丝绸之路与西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共同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的三大组成部分,为中外经济、文化、政治和文明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三峡博物馆黎小龙和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徐难于的《南方丝绸之路与西南早期的民族认知、民族认同》认为,周秦两汉是西南边疆地区由民族认知向民族认同转化的重要时期,而大一统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正是在边疆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的根基之上构建而成。南方丝绸之路不仅加深了巴蜀与西南民族地区的互动认知,并在不断积淀的民族认同的基础上直接促成了秦汉王朝对“西南夷”的开发与经略,从而在丰富和完善“五方之民”格局的同时完成了西南地区的民族认同。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汤洪《从丝路看屈辞外来文化的可能性》置屈辞于先秦广阔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语境之下,探寻屈辞域外文明来源,并认为这些外来文明的传播途径与南方丝绸之路大有关系。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杨静在《学术整合与文化自觉——南方丝绸之路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提出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西南地区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视野,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纳入南方丝绸之路视野之中,不仅具有学术整合的价值,还有促进各民族自觉和构建西南地区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此外,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屈小玲的《西南丝绸之路的干栏人家》、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李星星《从比较角度浅谈藏彝走廊中的“算日子书”》、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张勇《中印胥生说再考》、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高凯《从西南丝绸之路的开通蠡测印度麻风病传入的时间》等文章,也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探讨了南方丝绸之路的民俗文化和文化交流。

三、南方丝绸之路考古发现与文物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邓聪在《中越牙璋竖向刻纹辨识》中认为,近年东亚牙璋相继有新的发现,为理解牙璋传播路线提供了基础,除各地牙璋空间上平面分布的探讨外,通过时序先后仔细排比的认识,再迈向从牙璋出现时空差异与扩散历程等方向的突破,有望对东亚不同形式牙璋立体分布得出更具体的认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肖明华的《南丝路沿线发现的海贝二三事》调查了南丝路沿线现代世居民族使用的海贝及来源,确定出土的海贝是来自印度、缅甸,提出从古至今,以海贝为代表的贸易事项和以海贝为标志的南丝路交通从未停止过。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李

竞恒的《滇蜀地区出土早期佛教造像与西南传播路线》认为,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佛教造像开始在印度和东南亚地区流行,并逐渐通过滇缅道传播到滇蜀地区,并与当地的早期道教和神仙术信仰融合。从整个长江流域来看,滇蜀地区的佛教造像艺术出现最早,长江中下游后来出现的早期佛教造像艺术,都是通过西南滇缅道间接传入的。此外,四川省会理县文物管理所唐翔的《南方丝绸之路对会理特色传统建筑文化内涵的形成和影响》、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剑通过《跋邛崃福康桥功德碑》等文章,也对区域考古文化进行了研究和阐述。

四、南方丝绸之路艺术与宗教研究。四川省德阳市文联范小平在《四川画像石棺与西亚石棺艺术比较》中认为,四川东汉画像石棺与西亚的石棺装饰艺术确有可比较的地方。同为石棺葬具,有着东方文化共有的文化因素、审美习惯、相近的宗教思想。但由于地理环境、民族、时代等差异,也显示出较大的文化差别。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许序雅在《唐代骠国献乐考》中,对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骠国沿古代西南丝道赴长安献乐一事进行考释,认为骠国献乐不仅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也构成了唐代中后期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四川大学哲学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张泽洪《中外文化传播视野中的阿吒力教》认为,阿吒力教是流行于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佛教密宗,并与南诏大理国各族群有着密切联系。阿吒力教在南诏大理国的传播,经历了地方化、民族化的历史进程,从多方面影响到南诏大理国的宗教文化,值得我们从中外文化传播视野的角度予以探讨。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镇豪《谈谈商代开国名臣伊尹》指出,受到商族世代致祭的商王朝开国辅弼重臣伊尹,是中国上古史上少有的既载见地下出土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竹简帛书,又见诸传世文献的真实人物,他在商代史上的贡献与历史影响,主要在于其“能用非己之民”的政治识见与施政方略,还有他的军事用间才华,以及他拟划的“法君明分,法臣分定”的立法构思与他执行的“因其地势所献,必易得而不贵”的财经贡纳管理设计,其烹饪厨艺,则显其“致于王道”之进阶焉。

在研讨会上,学者们还充分讨论了南方丝绸之路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一致认为应当加强合作,积极拓展研究领域,从国内国外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面寻求突破口。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邹一清)

### 第三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会议综述

2011年9月17—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日本东方学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在武汉大学顺利召开。17日上午举行了简短而隆重的开幕式,武汉大学蒋昌忠副校长、日本东方学会兴膳宏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卜宪群所长分别致开幕辞,随后开始学术研讨。

围绕本届论坛的主题“朝野之间——中国中古国家秩序与地方社会”,来自中日两国的50